

王永福 吴秀惠 著

中医处方 门径与技巧

附：河图洛书与中医学

版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医处方门径与技巧

(第二版)

附：河图洛书与中医学

王永福 吴秀惠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医处方门径与技巧: 附河图洛书与中医学/王永福, 吴秀惠著. —2 版.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132 - 1277 - 9

I. ①中… II. ①王… ②吴… III. ①中医学 - 处方法
IV. ①R28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1322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北京市泽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87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2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2 - 1277 - 9

*

定价 28.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本很有特色的中医处方学专著，书中揭示了中医处方学的原理、思路与方法，提供给读者清晰而宽广的临证处方门径与技巧。

本书从三个方面进行叙述：一是对中医处方的原理与思维程序作了具体的分析，二是以证候为纲，详述了中医临证时应该掌握的基本治法与相应方药，三是引证古今医家的临床经验，列举出各种辨证方法与处方思路，以供读者借鉴。

本次修订过程中，增加了“河图洛书与中医学”的内容，旨在说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河图洛书模型的关系。

本书适用于临床医生，特别是初上临床的医务人员，是一本理论尽快指导临证实践的重要参考书。

世言真数开心意

——序《中医处方门径与技巧》第二版

《中医处方门径与技巧》是阐发辨证论治原理并启导临床处方门径与技巧的学术著作。第二版又增加了“河图洛书与中医学”，旨在说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河图洛书模型的关系。作者王永福和吴秀惠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资深教授，十多年前即有《中医处方门径与技巧》刊行。该书从1995年至今，曾梓版5次，印数达21000余册，以其昭晰确论，纾解实用，深飨学人。临床处方，其汤丸之所茹，乃方法之所施，虽千变万化，总是有章可循。由是，两作者又多年究研蓄学，以妙道独剖演明，增容理论而再道心曲，并增补河图洛书有关内容，可谓智略辐辏，开创新宇。

方剂是中医药的学术特点之一。处方之道，医之工巧。一个中医，从就学到行医，都离不开方子。老先生常套用学诗之谚，语云弟子：“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熟读汤头三百首，不待辨证已知方”。清代中叶以后，学医多以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为童子功，以配合《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课业。《汤头歌诀》等四种歌赋，又有“四小经典”之称。但是，会背诵汤头不等于会开方，方子合宜医理又未必尽合病家。可见，处方是一门理论联系实践的学问。方剂之学历史悠久，方剂学对方的结构和处方原理也有所阐述。然而方剂学又不等于处方学。

古代，不仅医家习方、研方、用方，士人也常逞意立方。据薛清录教授主编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所载，我国现存于各图书馆的古医籍，至1949年为13455种，而纯属方书者竟达2191种，可见其多。但这两千余种方书，记载方名和药味组成者多，论其构方原理者很少。先秦时对医生已有“为方者”之称。《吕氏春秋·似顺论》为“处方”列专章。宋代沈括在《沈氏良方·自序》中曰：“予尝论治病之五难：辨疾、治病、饮药、处方、别药，此五也。”民国以降，时逸人、秦伯未、沈焕章、施今墨等先辈以其著作开创了处方之学并列为教材，如时逸人有《中国处方学讲义》（1929年），秦伯未有《处方学》（1930年），沈焕章有《临证处方学》（1933年），施今墨有《处方学讲义》（1941年）等等，总数在10种之内，大体是从方之营构角度诠释组方，鲜有从辨证论治阐述制方者，更不复具处方技巧。本书则是从医理论及辨证论治，从辨证论治法则论及组方，从组方谈及遣药，从遣药谈及技巧，是理法方药一以贯之的著作。这是突围前代人处方学之首举。

本书以四诊取证开篇，逐次阐述了识病、求因、构思、立法到组方定剂的处方思维规律，继而对病因、脏腑、伤寒、温病等66种证候的证治和代表方剂逐证启解，续以在“活用辨证方法，开阔处方思路”的篇章中，以9法22条思路推究本源，挂钩接笋，疏陈治法，演明技巧，很多是结合医案而阐述，真可谓洞彻认证之玄机，推明处方用药之奥妙。是确论，是精要，令人在千变万化的辨证论治中有章可循，以技得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河图和洛书颇具神秘性。它们是《周易》象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和中医学理论至为密切。

关于河图，曾有一个“河序龙马”的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伏着一个白圈黑点的图形献给他，就是河图。伏羲据此画成八卦，后来演为《易经》，并用为治国方略，取得了政绩。又传说大禹治水时，洛水有背伏九个黑点书图的神龟呈献，它赋予大禹的智慧，有治水、铸九鼎的功绩。此即《易传·系辞》所言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合称“图书”，古人对其文化价值殊堪珍视，把典藏书籍之处称为图书馆，把研究河图、洛书的象数之道称为“河洛之学”。

河图和洛书起源于先民的祭祀和图腾，是远古人类发轫数学文明起始点的印迹之一，也成为古代科学技术的激发剂。古人认为“数”中含有自然规律，执信“天地生成，莫不有数”。将河图、洛书与阴阳、五行、八卦、元气和有关数字、图形，先后相串，互为基蕴，演绎成为用以解说道理和规律的象数易学。

河图与洛书在汉初乃至战国时皆存其图形，但流传至宋仅见诸文字，图形失传。宋代学者已考据出两个图的样式，世多以十数图为河图，九数图为洛书，唯陈抟、刘牧等以九数图为河图，十数图为洛书。此争论延续至今。当代有学者对西安半坡遗址及出土祭器彩陶上的抽象鱼纹进行分析，认为九数图是半坡鱼纹祭场布局分离出来的数据图，即为原始的河图。在河图的基础上，又变易出洛书。本书则从朱熹《周易本易》之图，以十数图为河图，以九数图为洛书。

河图是1到10的数的图像，其搭配如西汉杨雄在《太玄经》中所述：“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十相守。”把1到10的数分成阴阳奇偶，分别排在平面的上下左右和中央，寓喻《易传·系辞》所说的“天垂象，地成形”，即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在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在南，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在东，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在西，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在中央。1到10的加和是55，1至5的平方和也是55。55称大衍数。衍即繁衍无极，演绎变化无穷。认为大衍数中包藏着天、地、人变化之理。

洛书之图，即《黄帝九宫经》所说：“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宫，总御得失。”洛书又称九宫图，天数即1、3、5、7、9五个数，地数即2、4、6、8四个数，其和为45。此图5居中间，1、3、7、9四个数，分别居于北、东、西、南四正位。地数2、4、6、8分别居于西南、东南、西北、东北四隅。纵横斜分别连接三数之和，皆为15。此图与《易纬·乾凿度》之太乙下行九宫图一致。

河图洛书在古代学术研究之运用，乃是一个由具体→抽象→具体的过程。图像方法的特征是“拟诸形容”、“见其物宜”，进而用最简单的物象概括广大世界的演变规律，既是古老的象征系统，又是古代科技“开物成务”、“观象制器”的思维原型。《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说：“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滋而后有数”即是以数对滋长的象进行抽象。数具有模型的意义，称为数学模型。河图洛书的数学模型有三个意义：一是表述阴阳五行之

“阴道偶，阳道奇”及五行的时间、方位格局，在医学则以五脏和五行相配，说明五脏特性和相互关系。阴阳五行不仅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而且是古代中华文化的总框架。二是作为人与天地之气相应的数学表达，如《素问·六节藏象论》所谓“其生五，其气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素问·至真要大论》对这种论述生气通天规律概之为“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从通应的角度，得出人身为小宇宙的理念。三是以抽象的数学模型比类取象，开物成物，构建实体，成为医学、建筑、农学、天文、历法等科技、工程的发端。例如人体五脏的特性，循同五行生成之数：肾循同于天1地6之水，心循同于地2天7之火，肝循同于天3地8之木，肺循同于地4天9之金，脾循同于天5地10之土。有名的古都如西安、北京，其营造皆是按九宫八卦的格局来设计。从形而上者的道发为形而下者的器。

本书两作者运用二重证据法，以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物相结合，论证了“河图洛书的形成在《易经》之前”。作者依据对《内经》《白虎通义》以及《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的研究，提出了大藏象学说的理念，并指出，这是聪明的古代医家将五脏纳入河图模型而形成的，而由洛书发展而来的三阴三阳，促进了经络系统的形成，其河图的阴阳五行结合模式应用于临床，便是脏腑辨证的雏形。

全书递起演明和妙造的核心所在，为河图洛书是数学模型的论证。冯友兰先生称易学是“宇宙代数学”。河图洛书是易象数重要内容之一。对其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识昧渺虑的过

程。上古时代的河洛，同《周易》并无关系。《易传·系辞》最早将二者联系起来。西汉刘歆以八卦解释河图，以《尚书·洪范》解释洛书（《汉书·五行志》）。西汉杨雄则进一步视河洛为《周易》的来源，他在《核灵赋》中说：“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刘歆、杨雄的说法，后来被纬书所吸收。郑玄注《春秋纬》说：“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此又将河洛发展为两部著作，并取用了《周易》的九六之数。魏晋唐的易学家也没有对河洛的图式加以解读。北宋时易的图书学派大兴，创始人陈抟传于种放，种放以后分为三支：先天学派、图书学派、太极图学派。刘牧传授了图书学派，当时十分流行，成为学术界一大思潮，对当时的医学已经有所影响。《新校正》已经援用河洛之数再注《素问》了。明代医学和易学研究深入发展，形成了以张介宾为代表的医学，提出了象理合一、象气合一等理气不脱离象数之论，用河洛解读阴阳五行、运气和针刺手法等。清初学者对宋学体系进行了反思，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人与宋易的图书学、先天易学展开了学术辩论，胡渭在《易图明辨》一书中，搁置了图书学派在理论思维方面的阐发而不论，以汉学尊古的学风，运用考据学派研究典籍的方法，一辨以河洛图式解释八卦非原《周易》内容，二辨五行五方说与河洛之数无关，三辨五行并无生成数之量，四辨五行与脏腑相配，乃阴阳五行家之言，与《周易》之道本不相谋。其后江永的《河洛精蕴》在此基础上又有引申。应该说，清代考据学派在辨章学术、考证源流方

面，以其学养隆富而超迈前代，其论证流脉者大可穷源溯流。但其全凭现有传承之文献，不知地下尚有埋藏之上古史料；又对医籍所存之河洛遗珠不刊不审；更主要的是考据学派思绪保守，固滞一曲，以至昧于节次，没能使河洛之学发凡起例，直到清末民初才有所改观。例如唐容川在所著《医易通说》中系统有据地阐述了河图洛书与医理的关系，不特如此，唐容川、郑钦安、彭子益、邵同珍、邹趾痕等人，还以其专著和期刊连载，形成了当时医界的学术思潮，甫创出医易汇通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易学与医易研究又复火热，以多学科研究为特征，取得了理论上的新见解。本书的两位作者，在当时即投入并着力于河图洛书的研究，在数学家和医学家共同撰著的中医数学专著《医用近代数学》（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中，即有其撰写的总论，论中提出了河图洛书与中医学的关系。二十余年，真积力久，自得于心，此番作者又将新见资演成篇，真是光前裕后。

本书创辟新解之处颇多。不只对河图洛书有卓见，对《内经》的研究，很多是发注家所未见，对伤寒和温病的研究，从张仲景到叶天士，每每有医理易理之判，并联系现代医学知识予以阐述，更可贵的是，紧系临床处方，事由神解，深存瑰异。例如《素问·五脏别论》何以称“别论”？乃是针对河图五脏五行纳入医学所使然。又如“傍通”一语出自《易·系辞·说卦》，作者援用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十九·五脏六腑变化傍通诀第四》，全面解读了《内经》五行五脏的傍通体系，至为深湛。再如，作者指出《素问遗篇·刺法论》的“气

出于脑，即不邪干”的主旨是神经免疫问题；联系洛书和《素问·天元纪大论》指出六经之三阴三阳的本意是气有多少，同时论及三阴三阳具有病位、病邪、病性和病势等四种含义，并用小建中汤证、炙甘草汤证和大陷胸汤为例具体说明，这也同时论证了气化说是六经的实质。对于运气理论，作者指出，《难经》也有运气思想，以一年的阴阳消长图和伤寒阴阳胜复图比较、解读《伤寒论》的六经病势和传经，指出少阳为枢和少阴为枢的科学依据，以及厥阴病的本质是邪衰正虚。最有出新的是，以河图和洛书的数学模型，论证了五运和六气的理论源头：五运理源于河图，六气理渊于洛书。这使多年来论说益蓂、莫衷一是的玄机得以振拔。全书最后以整体论与还原论的比较，论及当代中医药学的发展，强调自主创新、现代化及与世界接轨，中医药的发展历程“将是系统论与还原论的互动对接，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共同发展”。

医家有言：“方多传于古人，用独抒其心得。”本书从学方讲起，进而阐述医理，最后上升到数学模型的层次，既多有创新发明，又嘉言可学实用。两位作者通才夙学、品学俱优，在四十多年前就结为伉俪。我在北京针灸骨伤学院任教时曾有幸与二位教授共事。王永福教授出身中医世家，1963年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先后执教于安徽中医学院、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和北京中医药大学，讲授《伤寒论》、《金匱要略》和《中医内科学》，一直不辍临床医疗，并担任行政职务，任教研室主任、教务处长、基础部主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和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吴秀惠教授1963年毕业于天津中医学院，也

先后在安徽中医学院、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和临床，一直任中医诊断教研室主任。两位教授谊切手足，淳朴谨笃，在任教的学校都为时隽，在心境相通中励学敦行，研究医学理论而有此成就。两人在临床上也针药并用，应汤即效。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明于有证。”两人以自己的临证和理论结合，撰著出这样一部理论上最为昭晰、精详博核，临证上技法得兼、实用备采的佳构。《素问·气穴论》说“世言真数开心意”，读此书后，心意大开，书中所言，真数也！我以此序向同道和挚友为祝。

孟庆云
于中国中医科学院
2013. 1

再版前言

《中医处方门径与技巧》自初版以来，得到了广大中医读者的青睐，我们非常感动，感动之余，促使我们把《河图洛书与中医学》也拿了出来，二书合并，再版发行。

《中医处方门径与技巧》是一部有别于方剂学的处方学著作。中医处方学与方剂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中医处方学是把基础理论与临床“辨证论治”方法结合起来，研究处方思路的一门交叉学科；中医方剂学是以治法为纲，分类研究方剂的组成结构与适应证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独立学科。处方学所综合的学科比较广泛，几乎可以囊括各门基础学科以及以内科为主的各门临床学科。方剂学与各门学科虽然也有联系，但它研究的重点毕竟是方剂的配伍与运用。处方学要以方剂学为基础，方剂学又是临证处方的举例与楷模，所以中医处方学源于方剂学，包含方剂学，但又宽于方剂学。

本处方学著作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处方原理与思维程序的分析。通过对“辨证论治”的理解，提出四诊取证、分科识病、辨证求因、构思治案、确立治法、组方定剂是临证处方的六大步骤，同时对每个步骤的原理和方法进行了论述。第二部分讨论临证处方应该掌握哪些基本方药。本书根据执简驭繁的原则，以基本证候为纲，提出应该掌握的对应该方剂和处方遣药方法。第三部分根据古今医家的临床实践，举出临床常见的各种辨证方法和处方思路，并用医案实例、名医经验和临床报导予以论证，其中当然也包含了不少处方技巧。这一部分

内容，古今医著尚未进行过系统的总结，此举为的是促进对中医处方思路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本处方学著作来阐明中医理论体系的融会贯通和随机应用方法，为建立清晰而宽广的处方思路提供门径。

“河图”“洛书”是以黑白点数按一定方位排列的数字图形。它们通过一定的数学思想的表达，传达出阴阳五行相结合的理念，可以看做是用数字形式表达阴阳五行理念的大宇宙理论模型。《周易函书约存》说：“若先天古易，止有卦画，河图洛书，只有图象，则儒家亦不传……而方技家藉此窃窥造化而秘宝之。”就是这样，方技家通过对“河图”“洛书”的“窃窥”，看透其所含阴阳五行相结合及人与宇宙一体化的寓意，把它作为模型，“造化”出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中医理论体系离不开阴阳五行，在过去介绍阴阳五行的文章或书籍中，有不少人认为阴阳来源于《易经》，五行最早见于《尚书·洪范》。这是没有研究“河图”“洛书”的结果，通过对“河图”“洛书”的研究可以看出，“河图”“洛书”才是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源头。

河图洛书与中医学的关系是多方面的。首先，“河图”“洛书”是形成中医藏象经络理论的原始数学模型。“河图”促成了中医藏象系统的创立；由“洛书”发展而来的三阴三阳，促进了中医经络系统的形成；“河图”的阴阳五行结合模式应用于临床，便是脏腑辨证的雏形。

中医学运用“河图”模型之前，医家对脏腑如何划分，处于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这种争鸣局面，聪明的医家通过

“河图”模型统一了脏腑划分的争鸣，但是“河图”的五行如何与脏腑、五官、形体及自然界等相配，也出现了争鸣。《吕氏春秋》、《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淮南子·坠形训》、《白虎通义》，有各种不同的配法，最后，《内经》统一了各种配法，通过触类旁通，形成了现在的藏象学说。

3数是“洛书”9数的最小公约数。“洛书”的九宫，包括横看三排各三小格，竖看三排各三小格，是3数的滥觞。3数代表天、地、人，是天地人的数字缩影，所以《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其生五，其气三。”“河图”也有“其生五”，但是没有“其气三”，“其气三”是“洛书”特有的思想。所以在一定场合，3数可以代表“洛书”思想的出现。

《易经》将“洛书”的3数与阴阳相结合，形成大男、中男、少男，大女、中女、少女。大、中、少是指阴阳的多少，这是《内经》、《难经》、《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的原始面貌。三阴三阳是“洛书”3数与阴阳的结合。所以三阴三阳可以看做是“洛书”的二级模型，“洛书”与中医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洛书”的二级模型三阴三阳上。

经络系统对三阴三阳的运用，是将上肢与下肢分别与三阴三阳相结合，形成手足三阴三阳，然后与脏腑相联系，形成十二经络系统。十二经络系统与脏腑系统二者的结合，是中医学对“洛书”模型与“河图”模型的联合运用。

其次，“洛书”与中医病理模式、九宫八风、灵龟八法和五运六气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建立和运用数学模型，是现代科学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

它的重要性正如北京大学胡宁教授所说：“正是根据开普勒模型，牛顿才提出万有引力理论和作为力学基本原理的牛顿三定律。……虽然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运动现象都服从牛顿力学规律，但人们却没有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这个规律，反而要通过日常生活之外的开普勒太阳系模型发现这个规律，这说明准确的模型对发展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这样，模型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那时虽有人体解剖的大体认识，但是没有显微镜，还看不到人体组织的细微结构和细胞的病理变化。那时不可能建立细胞学、组织学、细胞病理学、分子病理学，也没有形成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更不可能用现代理、化、生的实验方法来研究医学。在当时的科技水平上，要想建立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聪明的先民，巧妙地绕过了细微分析和理、化、生实验研究的道路，采用模型方法，在世界上首先建立起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医经验技术的发展确立了系统的理论框架，达到了世界传统医学所未能达到的水平。可见，准确的模型与发展科学理论的关系，不仅现代重要，对于古代中国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也至关重要。

由于学科专业的限制，我们对“河图”“洛书”的研究很肤浅，对处方学的研究也只是为了抛砖引玉，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道斧正。

王永福 吴秀惠

2013. 1